

马汉及其“海权”理论

刘永涛

[内容提要]马汉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及历史学家。他提出的“海权”理论不仅顺应并推动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占领海外经济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扩张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马汉本人特定的文化积淀以及他所处时代美国国内外文化思潮及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该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当时美国的历史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种族偏见以及思维方式,是美国现实主义强权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及历史学家。他所创立的“海权”理论为推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美国海外扩张的历史进程立下汗马功劳,并为以后美国历届政府推行对外政策和制订战争计划、谋求世界霸权地位产生重要影响和指导作用。他的理论著作还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欧洲及日本等国受到广泛重视,已成为这些国家考虑和制订对外政策及海洋战略的重要依据。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近百年后的今天,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安全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使美国将其目光及精力大幅度地再次投向太平洋彼岸的远东及亚洲其它地区,以谋求和保障它在那里新的经济及安全利益。有迹象表明,马汉的“海权”理论仍然有效地体现在冷战后美国外交和海洋战略思想及实践中。因此,我们对马汉及其“海权”理论进行重新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一)

1840年9月27日,马汉出生于美国哈得逊河畔西点军校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丹尼斯·哈特·马汉是该校著名的民用及军用工程学教授,祖父是十九世纪初来美国的爱尔兰移民。马汉的童年是在被称为“美国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度过的,这无疑对马汉日后的学业选择及军人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56年,年仅16岁的马汉不顾父亲劝阻,前往当时美国最高海军学府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求学。毕业后,以海军中尉的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

获得一定的实战经验。内战结束后,他在不同的战舰上供职,随舰艇巡游于各大洋,到过欧洲、南美洲、亚洲,还在日本和中国的港口停留过。1884年,美国创立海战学院,作为积极筹备海上扩张活动的一部分。次年,出任该院院长的斯蒂芬·鲁斯将军邀请正在南美洲值勤的马汉去该院讲授海上战术和海军史,当时已被提升为舰长的马汉欣然答应。不久,马汉接替鲁斯担任该院院长。1890年,马汉根据自己的授课讲稿整理出版了《1660—1783年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正式提出被西方资产阶级奉为经典的“海权”理论。该书与他后来的《1793—1812年间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和《纳尔逊生平——英国制海权的化身》(1897年)一起构成马汉“海权”理论三部曲,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们的床头书。1892—1893年,马汉再度出任海战学院院长。此时,他在华盛顿、伦敦、柏林和东京已经名声大噪。他的作品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出版界也密切注视着他。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学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威廉二世也分别接见他。1894年,马汉自满地写道:“伦敦时报称我为哥白尼第二,哥白尼告诉人们太阳是体系的中心,……我是第一个揭示海权是被诸事件所围绕的中心而不是它围绕事件的人”^[1]。

马汉与当时的几位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重要的国会议员们私人交往甚密,他的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进入并影响美国外交最高决策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他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

人物之一”^[2]。马汉为美国海军服役了40年,于1896年退休,专门从事写作^[3]。1902年,他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继续与美国海军界保持联系,譬如在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任美国海战委员会成员,1908—1912年间在海战学院担任特别工作。美国海军授予他海军少将军衔。1914年,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12月1日,马汉去世,享年74岁。

(二)

倘若对马汉的思想进行较为细致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海权”理论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1)强调民间商业航海及海军军事活动同国家利益及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2)规定一系列可用于指导美国海军战略决策的理论原则。一般而言,史学界对马汉理论的第一部分更感兴趣;在军政部门,人们则更注重如何准确恰当地运用马汉海上战略原则来处理可能发生的战局。不过,马汉本人把这两个方面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它们彼此相互依就。

马汉“海权”理论的主要支撑框架是建立海军体系、运输体系和驻泊体系,核心是强调国家对海洋拥有强有力的控制权;建立强大的海军体系是实现国家海上霸权的支柱。马汉认为,为了取得未来争霸战争的胜利,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能够取得海上统治地位的海军力量。有了强大的海军,国家就能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摧毁敌人的舰队,从而拥有制海权;否则,这个国家就不能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威势。不过,在马汉的思想逻辑里,海权并不仅仅指国家拥有强大的海军,还包括国家拥有庞大的商船队,即建立庞大的商船运输体系。他认为,商业和贸易是一个国家赖以富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家对海洋的兴趣主要应表现为对海上运输和商业贸易的兴趣,而国家贸易的繁荣和强大又是与国家海洋的控制密切相连的,“对海洋进行控制意味着在世界上占重要影响力,……也是构成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诸物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4]。海军舰队和商船队相辅相成,构成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内容。马汉还指出,建立广泛的驻泊体系也是“海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商船队和舰队在向海外扩张时,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和海军基地作为上述船只在海外停泊、交易、补给、避风和维修的据点,否则,“好比陆地上的鸟儿,不能飞出离岸边很远的地方”^[5]。由此可见,

海军体系、商船运输体系和驻泊体系构成马汉“海权”理论的三个重要连环。

任何国家尤其海洋国家在原则上都渴望发展自身的海权,但是,历史证明,只有少数国家(美国在内)能实现这一点。为了给予说明,马汉以早期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及美国的具体史例为证,列举了影响海权的六个基本条件。1)地理位置:如果一个国家所处地理位置既易于进攻又便于通往公海,还可以控制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那么,这个国家在获得海权方面具备了极优越的条件。2)自然结构(包括与此相关联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马汉认为,要想获得海权,国家不仅要有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港,还要建设良港和海岸基地。3)领土范围:马汉认为,发展海权不在于国家版图大小,而在于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特征。4)人口数量:国家要想成为海上力量,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口,尤其具有众多从事与航海业有关的人口。5)民族特征:如果人民有热爱经商的天性,通过发展海外商业贸易的途径致富,那么,这个国家才可能成为海权国。6)政府性质,包括国家的制度:马汉指出,政府的性质对国家的影响有两个相互区别但又密切相联的途径,即在平时时期,政府推动人民勤俭致富或鼓励他们寻求冒险向海洋获取财富,战时,政府运用相当规模的海军以保护本国商业船只在海外的贸易活动^[6]。从总体上看,这六个影响“海权”的条件可以大致归纳为两大类:前三个条件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后三个条件是人文方面的。它们为后来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定义权力要素内容确立了基本框架。

1911年,马汉出版了《海军战略:与陆战原则的对比》一书,集中叙述了海军战略原则,构成“海权”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马汉爱借拿破仑的一句话“战争是处理阵地的事务”来阐明自己的战略思想。他极其看重作战时的地缘作用,指出一个地方是否具有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它所处的位置;第二,它在军事上的攻守性;第三,所处地方本身及邻国的资源^[7]。在这里,马汉把地理条件列在首位,在他看来,后两条可以通过人的行为譬如加固工事或供给资源等办法加以弥补,而港口地势则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马汉还指出决定一个地方是否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次要条件,譬如它属于一个国家的贸易大市场;对该地方进行打击或摧毁,会挫败这个国家的繁荣;一个国家首都的沦

陷也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及其它方面。总之,利用良好的地理位置或打击敌人的战略位置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

其次是战略路线的重要性。在军事战略家眼里,战略路线即连接战略的路线,包括作战线、撤退线和交通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交通线,“交通支配着战争;从广义上考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看,它们是战争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8]。在马汉看来,控制海上交通线是决定海上战争胜负的另一个关键。

集中海上优势兵力给予敌人以毁灭性打击是马汉战略思想的基础。马汉认为,对海洋的控制不能像面包上抹黄油,到处部署力量,而要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中心地方,而快速调动兵力并拥有一支灵活机动的海军是实现集中海上兵力的必要条件。此外,马汉指出,海上进攻与沿海防守是海战中的两个方面,强调建设牢固的沿海防线和建设强大的海军军舰。他在“海权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对世界上重要的战略要冲的占领有赖于海权的控制,而获得海权的过程乃是不断加强海军建设的过程。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摧毁敌人,所以要主动出击。这种先发制人的进攻力是战争中的一个根本要素,海军力量的强弱则反映进攻力的强弱。反过来,国家沿海的防守力量则是海上进攻的保证^[9]。此外,马汉还为战争中的通讯、舰队、海防、速度、风险、威慑、报复、备战等战略战术问题规定了原则。

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分主要想解决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崛起所面临的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把海洋扩张同国家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第二部分则是为确立、支撑和扩大国家海权而设计的海上军事原则。

根据马汉的理论,从1889—1890年的萨摩亚争端开始,美国日益重视它的海军力量建设。经过哈里逊、麦金利、罗斯福和塔夫脱等几届美国政府的扩军计划,美国海军于1910年由世界的第十二位跃居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位。根据马汉的海军战略原则,美国舰队力量逐渐集中于太平洋,军事扩张的矛头直指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不幸:1898年6月兼并夏威夷岛;同年12月夺取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作为美西战争的成果;1899年在威克岛建立势力范围;1901年确立对古巴的“保护权”;1903年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乘机夺取运河的开采权和管辖

权;1905年及以后又使圣多明各、尼加拉瓜和海地沦为美国的“准保护国”。

(三)

从历史上看,马汉所处时代,正值美国确定从本土防御战略向半球战略过渡、从陆地扩张转向海洋扩张时期。这时的美国政治家及战略家们还不习惯于在世界范围的大棋盘上筹谋布局,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眼光从本土挪向海外。1890年12月,马汉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美国朝外看”一文,竭力劝说美国政府和民众放弃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传统,推行强势外交,向海外寻求广泛的贸易市场,加入世界霸权竞争行列。那么,美国应该朝哪里看呢?“门罗主义”已使拉丁美洲成为美国的后院,大西洋彼岸有英国,虽与美国存在矛盾,但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人后代,不会进攻美国,西班牙的海上势力在削弱,对美国威胁不大。美国人发现,他们的眼光应该投向太平洋地区,美国未来的利益及安全来自那里。马汉在关心布尔战争的同时,密切注视太平洋及远东地区发生的事件,因为他相信,这一地区在美国未来发展中会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依据他的“海权”理论,他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形成了系列的看法。1990年,马汉写了三篇文章,论述远东问题,并以“亚洲问题”为名汇集成册出版。

美国扩张朝外看,面临与其它文化相碰撞的问题。马汉已经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不仅是繁荣商业的场所,而且是东、西文化——种族、文明、宗教等——冲突的大战场。这位爱尔兰人的后裔不喜欢东方,认为东方文化停滞落后。1893年1月30日,马汉给《纽约时报》编辑写信,积极要求美国政府兼并夏威夷群岛,理由是夏威夷群岛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岛上有许多中国移民,“广大的中国民众——目前虽尚无生气——可能会在将来激起,在野蛮入侵的浪潮下埋葬西方文明”^[10]。为此,就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前后,马汉完全赞同这一政策,并认为门户开放不仅应该是贸易的开放,而且应该向欧洲的意识形态开放,让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最终通过西方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渗透使中国西方化。他说:“第一,阻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政治控制上占有支配地位;第二,坚持门户开放不仅指商业开放,而且指欧洲思想的进入。”^[11]我们看到,这时的马汉更多地考虑到的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商业占领,而且还有对

中国的文化征服。

在看待远东局势时,马汉已经注意到美、英、俄、日之间在那个地区所进行的激烈权力政治及军事较量。美国占据夏威夷、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屿,方便了美国进入中国诸海和长江流域。但是,美国在亚洲搞门户开放政策不同于它半个多世纪以前在自家“后院”搞的“门罗主义”。这一点马汉似乎已经意识到。马汉从种族角度分析了远东问题的复杂性。在马汉看来,中国人属于亚细亚人,亚细亚人在文化上是好静的;俄国人属于斯拉夫人,秉性彪悍粗野;日本人则被视为条顿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统。马汉认为,未来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不稳定主要来自不同文化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较量,并把俄国作为反对美国在那一地区搞“门户开放”的主要敌人,即斯拉夫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斗争。它与后来美国分析家和战略家作出的结论相一致的。1894年7月,马汉发表题为“英美国重新联合的可能性”一文,针对当时美国国内一些舆论,提出美英之间在远东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在长江流域建立强大的海军,共同阻止俄国在中国的野心,而合作的基础乃是两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血统以及在远东的共同利益。但是,他又认为,美英之间不搞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或协议,以保留各自国家在远东实现自身特殊利益的行动自由^[12]。显而易见,马汉的考虑是希望美国不受约束地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进行活动,最终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我们知道,马汉海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本国最大限度地获得海上自由活动的能力,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阻止别国获得这种能力。马汉有一个历史逻辑:只有一国霸权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及稳定;英国在衰落,世界动荡不安,一个新的世界霸主亟待确立,美国要当仁不让,这是“天定命运”。

起初,美国人观察到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技术、道德、民主、基督教及生活方式方面抱开明态度,便认为日本是西方在亚洲争取的对象,把美、英、日归为一类,联合阻止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日俄双方在持续的流血战争中精疲力尽,从而造成在中国出现一种“均衡性对抗”局面。然而,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及美日秘密签署的塔夫托——桂太郎协议,使马汉突然发现日本这个东方小国在政治上的野心和军事上的潜力,开始把日本看作是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敌人。“现实世界”再次促使马汉用

一种种族的观点分析远东局势。他认为,对付黄种人是美国的一项紧迫任务,因为亚洲人在文化上不能被同化,他们移民来到美国,是对美国的一种吞并行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海军学院已经开始设计假设的日美在太平洋发生海战的绝密作战计划,即所谓的“桔色计划”,并将其送给马汉提出修改意见。这时的马汉已经清楚地看见日本完全依赖海洋来谋求扩张势力范围的野心。未来亚太地区美、日、俄、中等经济政治构架在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初见端倪。

(四)

由于家庭来自爱尔兰文化传统的背景,马汉一生笃信罗马天主教,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力量。这种基督教文化深深熏陶着马汉的世界观,深刻影响着他对人性、战争、国家之间关系所抱的现实而悲观的看法,而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的“海权”理论中。直至去世之前,他仍认为他关于海权影响历史发展的伟大概念来自上帝^[13]。

其实,从唯物主义及人文的观点分析,有以下几种主要原因对马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一,马汉对欧洲历史的学习和研究直接对其提出“海权”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启发。1885—1889年,马汉有机会潜心阅读了大量西欧各国政治史和海军史,发现控制海洋是一个极为重要“却又从未得到系统评价和阐明的历史因素”。他在阅读德国史学家西奥多·蒙森的《罗马史》时领悟到,倘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控制了地中海,直接从海上进攻意大利,而不是经过长途的陆地跋涉,并在抵达后能通过水路与迦太基保持畅通联系,那么,整个战局就会是另一种情形^[14]。于是,马汉决定把一般历史与海洋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阅读普鲁斯—蓬费尔的法国海军史,从作者以冷静而富有哲理的方式总结历史的因果关系,并把它与海上事务联系起来的叙述中得到思想启发。他从瑞士军事家战略家安东尼·约米尼和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著作中获益匪浅,经过比较和琢磨,悟出一套海上作战原则。他对商业航海与海军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问题的特别兴趣,则来自法国人亨利·马丁撰写的一本法国史。通过对历史的广泛钻研、对前人思想的吸收,马汉终于发现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这种发现使他在思想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由从前反扩张主

义、反帝国主义态度转变成积极主张国家奉行海外扩张政策,由支持开明的民主党立场转向加入保守的共和党行列。马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还要感谢弗朗西斯·培根、沃尔特·雷利、西奥多·蒙森、威廉·内皮尔爵士、约翰·西利爵士和斯蒂芬·鲁斯等历史人物和同时代人,是他们帮助他发现、琢磨并运用了强调海上力量这一思想。马汉自己承认,他的那些说明“海权”理论的论述只不过抓住了一些尚处于原始或未被加工过的思想,利用“新的形式表达了一些老的东西”^[15]。

第二,如前所述,马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美战略文化的遗产,在研读和琢磨前人军事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发现陆地战略原则与海上战略原则在本质上有类似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约米尼及其他人关于陆地战略原则的精华,然后巧妙地将它们移植到海洋作战中,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海上作战原则,构成“海权”理论的重要部分。开创这种“战略嫁接”方法也算是马汉的战略天才之处。

马汉还发展了一种他称之为“类推法”的研究方法,即精心收集和筛选历史事实,然后应用所选择的事实来说明一些可以证明海上力量对历史构成影响的事件。这是一种推理演绎方法。我们在阅读马汉的著作时可以发现,他的思想核心并不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系统思考之后才形成的,他对历史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建立在严格的考证基础之上,而是非常功利地运用了历史事件或人物为他的思想理论作注脚和解释。可以说,马汉的许多想法往往正是凭一时的灵感或顿悟挥笔而就,然后再对其加以扩大、论证和充实。

第三,十九世纪后半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的繁杂国际思潮与美国国内新复活的“天命命运”意识形态遥相呼应,这种人文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汉“海权”理论在美国土壤上应运而生。进入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界相继出现(包括复兴)了不少“主义”或文化思潮,其中主要有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帝国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们结合在一起,相互补充和说明,构成十九世纪欧美人文思潮的主流,而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具综合性地体现了这些思潮。这些国际性理论思潮成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催化剂。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传统的“天命命运”口号在雄厚的国民经济支持下东山再起。如果说这个口号在十九世纪中叶被提出的时候只是表达了一种美国民

族情绪,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新兴金融政治寡头们则迫切地要将它变为行动,以便实现急于称霸世界的梦想。于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权力扩张在美国发生联姻,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思想在美国甚嚣尘上。

马汉同其他人一样,其言论充满着强烈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直接为美国国家利益及战略考虑服务。他认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同寻求占领国外市场的机会相结合,美国的剩余产品要跨越新的“边疆”——海洋——寻求市场,这种经济扩张过程必然会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美国应该拥有强大的海军作为其海外扩张的保证^[16]。马汉认为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道德感情在国际舞台上活动,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对于国家政策来说,自身利益既是合法的追求又是基本的追求,对此没有必要虚伪遮盖”,“国家的首要法则,如同人的首要法则一样,是自我保存。……生长是健康生命的特征,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扩张版图,但它的确意味着有权力使用任何正当手段去确保国家的进步”^[17]。马汉把自然界的生物法则移植到国家生活中作为国际关系的法则,强调国家发展空间,这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

综上所述,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的蚕食体系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的侵略体系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工业经济增长使美国选择了参与帝国主义海外扩张的道路。马汉的“海权”理论顺应并推动了美国国内谋求占领海外经济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扩张战略的需要。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马汉“海权”理论的问世也是马汉本人特定的文化积淀以及他所处时代美国国内外文化思潮及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海权”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当时美国在看待包括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内的国际关系时所体现出的历史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种族偏见、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反过来,该理论又作为美国扩张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对其它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和作用。从理论上讲,马汉“海权”理论的优势在于把政治学中权力问题和地理意义上的海洋问题结合起来,并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对它们提出独到见解,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海上权力体系。它不但丰富了西方(下转第 61 页)

一超级大国却不可能时时处处迫使其它国家在自己身后亦步亦趋,也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舆论压力,在某些联合国的和平行动中,美国不可避免地会认为自己的意图和利益受到了损害,因而它与这些和平行动的脱钩或背离也是可以预料的。并且,从长远来看,此种状况还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注:[1]美国亚特兰大卡特研究中心《会议报告》第5卷,第1期,第35页。

[2][3]参看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之二),第2页,第3页。

[4][8][14]参看美国白宫:《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1995年2月),第1页,第9页,第16页。

[5]参看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战略估计·1995》,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95年,第173—174页。

[6]参看拙作《90年代美国的防务政策的调整》,载于《亚太论坛》,1992年第1期,第10页。

[7]《纽约时报》,1993年9月12日,第A1页。 [9]英国《简氏防务周刊》,1993年9月8日。

[10][11]参看美国国防部长1995财政年度《国防报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第12页。

[12]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13]参看英国《简氏防务周刊》,1993年9月8日,10月25日。

[15]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风云中的联合国》,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16]参看1956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提出的维和行动三原则: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临时办法,并不妨碍当事国之权力、要求或立场;维和行动在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后才能实施;维和部队只有在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

[17]亚当·罗伯茨等编:《联合国:分裂的世界》,Clarendon出版社,1995年,第539—540页。这里不包括那些监督选举、调查等实际不涉及维和因素的行动。

[18]参看布雷德·罗伯茨编:《90年代的武器扩散》,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43—46页。

[19]Graham Allison编:《重新考虑美国的安全》,W. W. Norton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

[20]参看本文提及的美国政府有关文件和著作。

[21]英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战略概论·1994/95》,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22]同上,第58—59页。

(责任编辑 周珉)

(上接第73页)地缘政治学的内容,而且也是美国现实主义强权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注:[1][16]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沃尔特·拉费伯:《美国寻求机会,1865—191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第116—117页。

[2]W. D. 普尔斯特:《马汉生平及著作》,(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358页。

[3]马汉一生著述甚多,庞杂而零散;作品大致分为三类:“海权”著作系列,海军人物传记(包括自传体作品),论述外交政策、战争、冲突及海军管理方面的文章及译文。

[4]马汉:“夏威夷与我们未来的力量”(1893),载马汉:《现在与未来:美国对海上力量的利害关系》(1897)(纽约:肯尼卡特出版社,1970年),第52页;第31—32页。

[5][6]马汉:《1660—1783年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第40—41页;第28—89页。

[7][8]马汉《海军战略:与陆战原则的对比》(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11年),第132—163页;第164—199页。

[9]马汉:《与西班牙作战的教训》(1899);《回顾与展望:国际关系、海军及政治方面的研究》(1902),转引自《马汉著作选集:马汉论海军战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91年)。

[10]马汉:“亚洲形势对世界政策的影响”(1900),载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策的影响》(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第148页。

[11]马汉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转引自威廉·李威兹:《马汉论海权》(俄克拉何马: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47年),第198页。

[12]马汉:“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性”(1894),载马汉:《现在与未来:美国对海上力量的利害关系》(1897)(纽约:肯尼卡特出版社,1970年),第108—134页。

[13][15]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等编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14页;第415页。

[14]马汉:《从帆船时代到蒸汽时代:海军生活的回忆》(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07),第276页。马汉还在《1660—1783年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和有关信件中提及过汉尼拔依赖海上力量的问题。

[17]马汉:《亚洲问题》(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第97页,第29—30页。

(责任编辑 周珉)